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二)

(讨论稿 供校内使用)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目 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其 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38
党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53
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	69
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	111
党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42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反对张国焘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72
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7

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〇六页）

但是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则不同于俄国，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巨而独特的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这个任务。早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就指出过：

“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末，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新更伟大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页）这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应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〇四页）

这个艰巨而独特的任务为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毛泽东同志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一条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最高形式——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战争，开辟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继续革命。但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经过了艰苦的摸索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党领导了伟大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在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实现了由城市到乡村的伟大战略转变，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井冈山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国内政治形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中国革命的力量由进攻转为退却，经历了艰苦的过程。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国内政治形势是党实行战略转变的出发点，也是研究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本分歧的客观依据。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的基本情况是：

第一，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依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依靠封建势力，压迫人民大众。一九二七年九月蒋介石和张群访问日本，和日本帝国主义头子田

中义一密谈,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取得日本的支持;十一月与美国订立美蒋关系密约,通过宋子文同美国垄断资本勾结;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政府向北伐战争期间在南京炮击国民革命军和无辜居民的美、英、法、意帝国主义道歉赔款,五月同在济南制造惨案屠杀数千中国军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平谈判,表示要保护日本人“生命及财产之安全”;一九二九年蒋介石颁布新税则,降低外货进口税,使帝国主义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一九二九年入超达三亿一千九百万元,到一九三二年则猛增至八亿六千七百余万元,是中国历史上入超的最高纪录。帝国主义的投资额也大大增加。蒋介石以出卖民族利益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则残酷地压迫工农,支持封建地主阶级向农民反攻倒算,加租加息,有的地方田赋竟预征到一九七〇年以后。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利益全部被剥夺,工会被封闭,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禁止工人罢工,对坚持革命斗争的革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跟着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但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权利,民族资本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逐年下降。以民族资本最发达的纺织业为例,一九二七年华商占全国纱锭总数59.7%,一九三一年就降为55.7%;一九二八年华商占全国布机总数56.7%,一九三一年便降为48.4%。上海尤为突出,一九二七年底以前,民族资本的工厂1,295家,到一九三一年只剩下795家,四年中改组倒闭的工厂占原有厂数38%以上,卷烟厂倒闭工厂占原有总厂数60%以上。上述资料表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依然是地主豪绅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一切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出发点。

第二，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连年不断。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分别支持国民党各派新军阀，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一手操纵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铁路会议、军事缩编会议以及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企图独揽财政经济大权，扩充武力，排斥异己，使各派军阀矛盾尖锐化。由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〇年三年内，国民党新军阀爆发了六、七次较大规模的内战。一九二七年十月发生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十二月又爆发了蒋介石、桂系和广东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发生了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爆发了蒋介石和广西军阀争夺华中的战争；一九二九年八月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四月又爆发了第二次蒋和冯、阎的战争。三年间，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是近代史上所没有的。新军阀的混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中国的矛盾和冲突的反映，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使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一个个地战胜了它的对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第三，敌强我弱，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大部被打散，党员由大革

命时期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二百八十八万人下降到三万人；大革命时期全国农协会员发展到九百一十五万人，现在大部被打散。蒋介石建立起全国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强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城市的统治更加严酷。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半年多就野蛮地屠杀了三十三万七千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毛泽东同志论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年来的斗争形势时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七六——七七页）这一切表明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

上述三个基本情况表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敌人虽然强大，但他们是不统一的，我们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敌人统治中心在城市，革命必须由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攻，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推动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革命在艰苦的斗争中实现了这个转变。

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一）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陈独秀在全党反对下被迫下台，

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等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同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武汉国民党政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明确提出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同志主持，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参加，邓小平同志列席。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首先批判了陈独秀自动放弃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严重错误。他形象地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比做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必须当革命统一战线的主人。并且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农民土地问题是极大的问题，必须没收地主土地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还批判了陈独秀不抓军队，放弃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重视。现在要特别重视军事问题，这次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毛泽东同志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会议坚决反对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定了新的策略路线，决定了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一—三五页）

（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周恩来同志向中央常委会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中央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委员还有恽代英、彭湃等同志)组织领导这次起义。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到达南昌。

为什么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呢？当时南昌的形势是：第一，南昌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准备了革命骨干力量。如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并在南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训练班学员后来许多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同时南昌国民党右派势力段锡朋等人已为南昌革命群众所驱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较大，有大批党团员骨干力量。第二，我党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当时我党控制的军队有原属于张发奎（广东军阀）第二方面军的贺龙第二十军、叶挺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正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从武汉调来九江。南昌有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武汉方面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和卢德铭、罗荣桓等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些部队总数达三万人，都准备集中南昌。第三，南昌敌人力量比较空虚。蒋介石离开南昌后，把守备南昌的任务交给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这时朱培德在庐山开会，朱部所属第三军和第九军大部分部队分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只有朱培德一个指挥部和一个直属警备团，以及第三军第九军各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总兵力约一万余人。

因此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南昌起义的条件是具备的。同时敌人正阴谋策划调动三个军对叶、贺部队形成包围之势，妄图吃掉这些军队。军事形势十分紧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同志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在南昌组织军

队武装起义的决定，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定于七月三十日晚举行起义。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到贺龙二十军指挥部通知贺龙关于起义的决定，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同志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同志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由贺龙同志和起义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制定起义计划，叶挺、贺龙分别向各级军官下达起义的决定和部署。负责保卫工作的陈赓同志，组织群众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扫清起义的障碍。七月二十八日前委派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和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秘密联席会议，决定由省委负责紧急动员群众，重新武装南昌工人和农民，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准备配合起义。

可是，在起义即将发动的紧要时刻，受到了张国焘机会主义的干扰。起义前夕，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阻止起义，遭到恽代英、贺昌、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当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行将就绪时，七月二十九日张国焘一天两次打电报给前委，说什么“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当即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起义问题。张国焘说：起义如有成功把握，方可举行，否则不可起义。共产党员可退出军队，到各地去做工作。他特别强调要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因为张有实力，必须张发奎同意才能举行起义，否则就是“蛮干”、“盲动”。这实际上是反对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阀身上，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继续。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坚定地表示，起义断断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并提出，张发奎已发来急电，命令叶贺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待命，显然是要解除我武装，因此张发奎决不会同意

我党的起义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争论了一整天未作出决定。七月三十一日又继续辩论。张国焘说这次武装行动只作为一次“兵变”，起义领导机构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周恩来同志说：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并且愤慨地说：宣言“由我来改”。张国焘最后被迫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挫败了他破坏起义的阴谋。前委当即决定起义改在八月一日凌晨举行，周恩来同志并签发了由叶挺同志起草的以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的作战命令。

八月一日凌晨，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三万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攻击敌军，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东方破晓时，起义军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一万余人，南昌城头红旗招展，万民欢腾。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吴玉章、贺龙、叶挺、彭湃、恽代英、何香凝、徐特立、林伯渠、郭沫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发布了《起义宣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以及关于通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命令等，这些文件提出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等政治主张。同时，在前委的主持下，将参加起义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军：即第九军，朱德任副军长，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这样，党独立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军队，就从此诞生了。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吓坏了敌人。蒋介石、汪精卫从南京、武汉和广州调集大批军队向南昌进攻。在起义军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革命委员会决定迅速撤出南昌，准备南征入粤，回到工农运动发动较早的广东，占领广州

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革命。八月五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经赣南闽西进入广东境内，长途行军，转战千里，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斗争，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解放了潮州汕头。但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军遭受了失败，一部由朱德同志率领沿闽粤赣边界退到赣南粤北一带，后由湘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一部突围到海陆丰与彭湃同志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党在大革命的转变关头，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摸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有着重大的意义。南昌起义在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它英勇地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第一枪冲开了反革命屠杀的枪林剑树，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又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了；这第一枪划破了中国黑沉沉的夜空，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第一枪打碎了投降主义者的枷锁，从此开始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新篇章。南昌起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南昌起义创建了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授给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同志一等红星奖章。一九四九年初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旗上要有五角星，表示南昌起义是在党领导下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

南昌起义证明，在革命已转入了低潮的情况下，重新占领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想打回广东，然后

进行第二次北伐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起义军没有在江西就地革命，和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就不免于失败。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必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三、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 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到乡村转变的开始

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决议。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明确指出，这次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乡村政权或县政权“向反革命势力进攻”。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江西湖南两省秋收起义。以易礼容为书记的原湖南省委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以彭公达为书记，由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组成。八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到长沙，八月十八日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省委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新精神，讨论了秋收起义计划。在讨论土地革命，军事和起义区域等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反对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统一了认识。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一种意见是只对地主土地“政治没收”，

即只没收反革命大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中小地主土地，否则他们就会“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另一种意见则要“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毛泽东同志反对这两种意见，认为中国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如只没收反革命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但也不能没收全部土地，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提出应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军事问题，一种意见是只强调“把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反对用军事力量作农民起义的骨干，认为强调军事力量是什么“军事投机”；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忽视农民的作用，认为“农民只能做暴动的附和者”，“很少想自己起来建立政府”。毛泽东同志反对这两种意见，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发动、组织、武装农民，同时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就难免要失败。“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同志又一次阐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开始时省委大多数人主张在全省四个区域同时起义（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之间以宝庆为中心）就是要夺取整个湖南。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当时敌强我弱，在全省暴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经过几次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以长沙为中心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地区举行秋收起义。会议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压迫民众，屠杀群众的工具”，因此，决定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而用共产党的名义号召起义，起义建

立的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关于起义的领导机关问题，省委决定组织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到安源，八月下旬在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秋收起义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事负责人、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农民运动负责人等。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报告了改组湖南省委的情况和省委秋收暴动的计划，并决定将我党掌握的湘东赣西一带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后在芦溪牺牲），师长余洒度（后叛变），副师长余贲民。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和平江工农义勇队、湖北崇阳农民自卫军（罗荣桓率领）组成，驻江西修水；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萍乡、醴陵、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组成，驻安源；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后逃跑叛变，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时被我们处决），党代表潘心源，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组成，驻铜鼓。三个团兵力合计五千多人。这次会议还确定了起义的进攻路线。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兵分三路。第一团九月九日从修水出发向长寿街、平江进攻，胜利地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收编在起义部队中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部叛变，向我军袭击，使一团腹背受敌，牺牲了一百多人，战斗失利，向浏阳方向转移。第二团九月五日晚秘密处决了安源矿警队队长等几个反动军官，纯洁了内部，九月十日在安源起义，十二日攻克醴陵，十五日顺利地占领浏阳城，但因团的主要领导人（王新亚）骄傲轻敌，未及撤出浏阳，结果敌人增援，起义部队陷入重围，在突围中损

失三分之二，起义军严重失利。毛泽东同志九月十日由安源赶到铜鼓，亲自指挥第三团战斗，十一日向浏阳白沙镇进攻，首战告捷，十二日胜利占领东门市。十四日唐生智新八军两个团两路攻来，我军水土不服，受部分损失，分三路向浏阳上坪转移。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当即决定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适时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起义时湖南全省唐生智兵力三万五千六百多人，仅长沙城内就有六千多人。起义军只有五千多人，大部分是缺乏训练的工农武装。九月十九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根据地。余洒度等不承认革命形势是低潮，不承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否认我起义失利，盲目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不打长沙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

文家市会议后第二天，九月二十日，在里仁学校操场召集了起义部队全体人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向整编后的一千五百名工农革命军进行动员。毛泽东同志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胜败是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有千千万万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就能用小石头打破敌人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秋收起义原计划